

# 为季羡林辩

几多风光几多愁

别号

张曼菱 著



# 为李美林辩

## 几多风光几多愁

张曼菱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策划 / 出品 : 胡洪侠  
责任编辑 : 高照亮 汪小玲  
装帧设计 : 刘晓翔工作室  
封面题词 : 邵燕祥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为季羨林辩 : 几多风光几多愁 / 张曼菱著 . -- 深圳 :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 2016.12  
ISBN 978-7-80709-763-1

I . ① 为 … II . ① 张 … III . ① 季羨林 ( 1911-2009 ) - 生平事迹 IV . ①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2249 号

为季羨林辩 : 几多风光几多愁  
张曼菱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 2 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mm × 1092mm 1/32 字数 : 10 千字 印张 : 7.625  
ISBN 978-7-80709-763-1 定价 : 55.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张 曼 菱

汉族，女，云南人。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八二年毕业，到天津作协做专业作家，职称“一级”。一九九八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

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小说《唱着来唱着去》；散文集《北大才女》；回忆录《中国布衣》《北大回忆》；评论集《张曼菱评点〈红楼梦〉》；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

## 序言

- 003 命运与担当 / 钱理群

## 自序

- 015 一个人的位置

## 上篇 校园本色

- 023 一 相识于“竞选”风潮  
047 二 朗润园：一条文化的长河  
073 三 疾呼“研究‘文革’史”与“控诉”的权利  
091 四 米寿：“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 中篇 高处不胜寒

- 115 五 在医院：先生失去最后的私人空间  
129 六 “唐僧肉”的多角折射

## 下篇 一生真伪有谁知

- 157 七 批评者的背景与“乡愁”
- 167 八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
- 191 九 “为自己不是右派而愧疚”的人品与宿命苦酒

## 后记

- 215 守望

## 别传附档

- 225 季羨林先生生平

# 序 言





## 命运与担当

钱理群

这是一本感情真挚又大有深意的书。曼菱自由无羁地书写她和季老的“忘年交”，又随时放言议论关于北大的传统、关于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这些话题也都是我感兴趣的，边读边想，随手写下，算是对曼菱的回应。

说起北大传统，我总要想起杜威对蔡元培的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北大的评价。从这一角度看，北大在二十世纪曾经几次对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思想、文化的

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可以称作“世纪辉煌”。在我看来，所谓“北大精神传统”正是在这样辉煌的历史瞬间所显现、培育的。其中就有本书所着重讨论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北大教授，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记得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我和北大部分师生一起编写、演出话剧《蔡元培》，着重展现的就是蔡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四处奔走营救被捕学生的那历史的一幕，其中一个场面是被捕学生回到学校，蔡校长向全校师生深深一鞠躬，说：“把被捕同学如数交给诸位，我尽责了！”每回演到这里，现场每个演员、观众无不动容。但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就没有了这样的历史的一幕：那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为蒙难学生说话。这整体性的沉默，迟早引发良知尚存的北大人内心的不安。我自己是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发现一九五七年的历史依然被歪曲，突然产生了耻辱感，并和一些朋友一起编选了《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共三册），提出要建立“一九五七年学”，恢复历史的真相。我们这一还债之举得到了季羨林先生的全力支持，他亲任顾问，并为“文丛”题字。我读本书后才知道季老私下曾对人说，他“为自己不是右派而愧疚”。那么，他也是为自己没有与一九五七年的受害者共同承担苦难而感到愧疚。后来，我们

所做的重新评价反右派斗争的努力，受到了当局的注意与问责，并且牵涉到我，有关领导还专门来调查。在这关键时刻，季羨林先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样的保护后学、敢于担当的风骨，让我感佩不已，终生难忘。

因此，那年夏天，季羨林先生的态度和举动就绝非偶然。曼菱在本书里对此有一个相当精辟的分析：别人也会愧疚，只是压抑于心；季羨林先生却可以因为愧疚而“自请入地狱”。这就“把道义责任的完成提高到了‘生命羞耻’的地步”，这样的“知耻近乎勇”是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其实，当时许多的北大老师都有这样的耻辱感，虽然心存不安，但大多数还是选择了沉默。因此在先生仙逝后，我从曼菱这里得知，季老当年就做出了“独往矣”的选择，“冲破知识界习惯性的沉默和隐忍，实践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知识分子天职”，我感到了极度震惊和无地自容！更联想到在那个历史关头，这样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的，还有朱德熙、王瑶等先生，就不由得对这些前辈学者顿生敬意。可以说，他们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将自己的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骨气、正气，全部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这又是一个瞬间辉煌。而且，在我的感觉里，对于北大来说，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的“辉煌”。

既然谈“最后”，就不能不说到以后的事显示出的季羨

林先生的另一面，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中更加严峻的方面。

说到知识分子的厄运，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强迫“改造”。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知识成了原罪，知识分子被视为批判、打击的对象，就像季羨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里所描述的那样，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肉体折磨与精神屈辱，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打骂，还要无休止地自诬自辱。这自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不堪的一页。但人们却忽略了另一种命运——知识分子突然成了有充分利用价值的“香饽饽”，在“尊重知识”的旗号下，一切都向知识分子敞开：要荣誉有荣誉，要地位有地位，要钱有钱，甚至要权有权，但要一个条件：听话，配合。季羨林先生的最大不幸，就是应“上面”要求，由北大推荐，被定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一举推向社会顶峰”，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象”。应该说，季先生至少在一开始对这意图是清楚的，他不无沉重地说：“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是一种新的屈辱，因而也是更严峻的人格考验。季老一开始是拒绝的。面对神化自己的种种谀辞，他回答说：“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

外一个人。”他心里明白：“有人不让他‘做自己’，要他做‘另外一个人’。”为此，他不断地申说，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坐冷板凳”，不受任何干扰地做学问，做自己想做的，不顾及别人需要的冷学问。但在中国，就是不让季老和所有与他有类似追求的知识分子“坐冷板凳”。开始是永无休止的斗争与改造，不准“坐”，“坐”就是有罪，以至季老七十岁以后才“坐”下来，坐了十八年的冷板凳，完成近八百万字的皇皇大作，可见其创造潜力之大。但现在，却要用种种诱惑与干扰，让他坐不下来，久而久之就习惯于甚至安于不坐冷板凳了，一切创造性的独立的知识劳动生产也就此终止。季老说，正是这名不副实的吹捧使他陷入失去知识分子本分的危机，他为之“吃不安，睡不安”。也就是这样的“不安”，表明了季羡林先生对知识分子在所谓“新时期”面临的新厄运的清醒，以及他在新的历史困境下对知识分子本职的坚守。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他没有坚守到底。曼菱说，“他在抵御。可惜这抵御的声音没法传递出去，终于越来越弱”，以至他说出了别人要求他说，而不是自己真想说的话，做了一些“恐怕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逐渐变成了被人们非议的人。而且他已经被有关方面有意与外界隔开来，人们也无法知道季老是否知道这一切，他对此做何反应。这里只能讲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我曾经对季老的某些言论在私下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出于对老师辈的尊重，没有公开发表，却被一个学生写文章捅了出去，不久就听人说，“大管家”对此颇有微词，但以后记不得在什么场合，我有机会见到季老，他依然一如过去一样，对我表示好感，这让我有些尴尬，也很感动，心里想，或许这并不只是一种老人的宽容，他自己对事情的是非还是心里有数的。

无论如何，季老在被“奉为圣贤楷模”后的违心配合，已经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史、精神史上的一个典型现象，值得认真研究。曼菱在书中介绍了一位年轻人的解释：按照自己的意志制造知识分子典范是当局的一个举措，先生对此“心知肚明”，而他自己“见过中国的乱世，他也希望维稳”，也就“配合”之。这算是一种说法吧。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季老自己也承认的“人格不过硬”，其中也有我们下文还会提到的人性的弱点；而善于利用人性弱点，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以及国民性的弱点，又是中国体制的特点与问题。不可忽视的，还有曼菱所提到的，季羡林先生在有关部门的特意安排下，与北大人交往受到限制，以至隔绝。这对季老更是致命的：他的生命本来是与北大休戚与共、生死相依、融为一体的，把他硬生生地从北大这一生命之根拔出，他就失去了支撑和力量，这是他最后软弱与屈从的一个重要

原因。而且他自己心里是明白的，和曼菱的越来越难得的见面，他每次表现出的温情与依恋，似乎有什么难言之苦，这是特别让人心酸的。

季老和当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和厄运，还不止于此。随着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扩大，其地位与影响本身，在商业社会里，就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财富”，而像季羡林这样被中央领导关注、为万众瞩目的“大知识分子”，其拥有的文化资本就更加可观。而他因为个人兴趣积累下来的文物字画，更具有直接的同样可观的市场价值。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季羡林这样著名的知识分子又有了商业的利用价值：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季老身边形成了“几个利益圈”，彼此恶斗，他自己成了“唐僧肉”，就绝非偶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季老的暮年，而如曼菱所分析，“老年人在生活料理上与外界交流时都必须依赖他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屈从的心理，一种恐惧感”，这样的老人的人性弱点竟然被利用来加强对他的控制和利用，这是“不人道的，对季老是一种残忍”：他终于没有逃脱“寿则辱”的命运。

但季老并不总是糊涂，甚至可以说，在最后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太多的不幸的世界时，他还是保持了清醒。他最后嘱咐曼菱要写《浮生六记》那样的作品。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意愿，如曼菱所分析，这“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

巨大悲哀”，又表现了对“生命处在自在自为状态”的向往。他临终前特地交代要把曼菱父亲为自己写的祝寿辞送还，而祝寿辞上所写的八个字“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恰恰表明了季羨林先生自己一生的信念与追求：无论寒、温都不改本色。联系前文所讨论的季羨林和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多世纪所面临的各种历史厄运，尽管曾经有过妥协，甚至屈从，但他最后还是坚守了知识分子的本分。

曼菱书中谈到，陈四益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引述鲁迅在他的老师章太炎逝世后所做的历史评价：虽不免“白圭之玷”，但其“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模”，认为鲁迅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如何总结和评价季羨林先生的一生有启示意义——这也是此刻我想说的话。

我还注意到，鲁迅在悼念文章里特意提到，章太炎先生去世后，有人“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并表示了他的愤怒与悲哀。历史竟然也如此相似：在终于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人世，季老依然不能入土为安，除陷入打着他的旗号的没完没了的官司，还遭到了国内，特别是海外的种种幸灾乐祸的指责和嘲笑。曼菱说，面对这样的隔岸观火的义正词严的“高论”，她每有“夏虫不可以语冰”之感。我能理解曼菱的感受，我自己在国内常常对现实有尖锐的公开批判，



但到了国外，特别是面对那些居高临下的说辞，无论是对国内政治的批评，还是对国内知识分子处境的同情，我大都沉默以对，心想，国内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曼菱说得好：“国内学者所经历的曲折与辛酸，是难以对外人道的。而国内学者所承担的责任和那种‘跌倒又爬起来’的弘毅精神，虽九死而不悔地推动着中国大地艰难前进，这种奉献与作用，则更是海外人所难以取代的。”因此，“为季羨林辩”是必要、必需的，这也是为处境艰难、历经坎坷的国内知识分子辩。季羨林先生一生的经历集中代表了始终没有离开中国这块土地的知识分子的不幸，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设身处地的对待。他（他们）在磨难之中对知识分子本色、本职的坚守和承担应该得到尊重和尊敬。而深陷泥泞之中发生的精神迷误，暴露的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和理解。其所暴露的人格缺陷，在分清是非、吸取教训以后，也应该得到宽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求“完人”“完美无缺”的苛责，不过是道学家者言。这恰恰是应该抛弃的传统，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理解与宽容。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